

加尔布雷思回忆录

我们 时代的 生活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祁阿红 王喜六 李建波 王文江 等译
祁阿红 尹礼荣 校

5.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加尔布雷思回忆录

我们 时代的 生活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祁阿红 王喜六 李建波 王文江 等译
祁阿红 尹礼荣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Life in Our Time: Memoirs

Copyright ©1981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江苏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国际)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 书 名 我们时代的生活——加尔布雷思回忆录
著 者 [美]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译 者 祁阿红 王喜六 李建波 王文江等
译 校 祁阿红 尹礼荣
责任编辑 余江涛
特约编辑 尹礼荣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 插页 2
字 数 47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07-5/K·339
定 价 2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加尔布雷思的生平、著作和主要学术观点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加尔布雷思 1908 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农场主家庭，早年在加拿大就学。1931 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研究农业经济，于 1934 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这时他结识了在哈佛大学念书的约翰·肯尼迪兄弟，开始了和肯尼迪家族的交往。1941—1943 年，加尔布雷思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负责物价管理。之后，加尔布雷思进入《幸福》杂志编辑部任编辑。1945 年 5 月，他被任命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局处长，负责调查二战中盟国的轰炸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1946 年，加尔布雷思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负责检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的经济政策，期间因工作卓有成绩，获自由奖章。1947 年他回到《幸福》杂志编辑部。1949 年起，加尔布雷思任哈佛大学教授。1952、1956、1960、1968、1972 年总统选举期间，加尔布雷思都是民主党的重要谋士。1960 年他积极帮助约翰·肯尼迪竞选，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加尔布雷思作为总统的密友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这一重要角色。

1949 年加尔布雷思返回哈佛大学后，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理论研究上。1952 年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抵消力量之概念》出版，这标志着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正式奠基。1958 年，

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富裕社会》出版,并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加尔布雷思自称该书是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对美国社会的面貌有一大致的了解。1967年,他的更加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重视的《新工业国》出版。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说《富裕社会》是一扇窗户,《新工业国》就是一幢房子,因为它涉及的是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1973年,加尔布雷思最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学与公共目的》出版。一方面,加尔布雷思在该书中将以前发表过的各个主要论点集中起来,系统地考察整个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以制度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论和一系列政策建议。1977年,加尔布雷思又写了《不确定的年代》一书,该书的出版同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很大注意。《不确定的年代》还被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同名的电视片,在西欧和美国连续播放,扩大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增大了加尔布雷思的名气。加尔布雷思曾于1972年作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代表团的成员来我国访问,并应邀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作了题为《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学术讲座。

加尔布雷思作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学术观点有:第一,权力转移论。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在现代社会中,专门知识成了决定企业成功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从资本的供给者手中转到专门知识的拥有者即“技术结构阶层”手中。第二,公司新目标论。加尔布雷思认为“技术结构阶层”不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技术结构阶层的主要目标是企业的“稳定”和“增长”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探索知识的“技术兴趣”。第三,生产者主权论。加尔布雷思认为,“消费者主权”主要存在于以往的社会中。在工业发达和大公司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生产者自行设计和生产出商品,并控制了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信网和推销机构劝说消费者,设法让消费者听从生产者的指示,

按生产者设计好的销售计划和规定的价格购买生产者的产品。第四,二元体系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包括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经济,即若干家大公司组成的经济,它实行计划经济,所以称为计划体系;另一部分由许多分散的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组成,它听命于市场,所以称作市场体系。现代经济包括这两部分,所以被称为“二元体系”。二元体系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计划“支配它的环境”,市场体系“一般地仍受环境支配”。第五,结构改革论。加尔布雷思认为,二元体系的存在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使得有必要在美国实行所谓的结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改革二元体系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均等化;运用政府的法律和经济措施增强市场体系的权力;运用不同的法律和经济措施削弱计划体系的权力;整个二元体系的改革以公共目标成为国家的目标为先决条件;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由科学教育界承担。第六,信念解放论。加尔布雷思认为,要完成结构改革必须从信念的解放入手。所谓信念的解放,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当今社会流行的传统观点下解放出来,必须对“是非”、“善恶”作出评价,消除工业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不平等和紧张,追求和谐的生活,实现悠闲、有保障和安乐。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反正宗的叛逆者面貌出现在美国经济学界的,作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加尔布雷思更是一位反对经济学正宗——凯恩斯主义的标新立异者。然而,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所说,加尔布雷思是“一个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但却驻足于经济学主流之中的经济学家”。

赵学清

1998年7月于南京

鸣 谢

一位朋友曾对我谈到他为诺埃尔·科沃德送行的事。科沃德要到牙买加去,打算在那里写回忆录。他问科沃德是否已占有足够的笔记和资料,他答道:“没有。可我记忆力很好,实际上,有些记性很好的人还常来问我。”我写这部回忆录,情况和科沃德差不多。虽然手头上有些笔记,有些出版物和其他材料,但基本上是凭我的记忆;而且我和他一样信心十足。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记得很清楚,对其间比较突出的谈话、行动、声明、讲演、场景乃至一些怪事都记忆犹新。然而,遗憾的是,在准确生动的描述中一些必不可少的日期、人物的全名、小地方的地形地貌,还有其他一些细节我已淡忘。所幸的是,我的朋友和搭档安德烈娅·威廉斯(本书中将经常提到她)一直给我以很大的帮助,使我把情况搞清楚或基本搞清楚。在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方面,我得到了博学多识的好同事、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工作的伦达·希宾格以及我的好友、漂亮的罗莎玛丽娅·托鲁诺·坦格蒂的大力帮助。坦格蒂在美国生活和索摩查家族的尼加拉瓜这两个研究课题中选择了前者。她不厌其烦地将本书的手稿打成文稿,进行修改并最后打成,我甚为感激。同时,我还要感谢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贝尔。韦尔斯利镇的伊迪丝·塔克趁不在该镇的极好的校董事会任职期间,替我主持办公室的工作,使我能集中精力写作本书。我曾在别处称她为近年来最最称职的办公室经理。她取代了从伦敦来帮我的萨拉·菲尔德-约翰逊。萨拉因为必须履行身为人妻的义务才不得不离开了我。

她离开后,我处处感到不便。在此,我要向塔克夫人和菲尔德-约翰逊夫人致以热切和诚挚的感谢。

凯瑟琳·加尔布雷思读了全部书稿,提供了许多信息,并作了许多修正。她和我们能干的儿子约翰·艾伦、彼得·伍达德、詹姆斯·肯尼思一样,自始至终在本书中出现;如果说本书中对他们写得不多,那部分原因在于本书主要是想写社会上的事件、人物和各种观念。我之所以没有多写自己家庭内的情况和个人的生活,另一部分原因是这方面没有多少伤心事。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要我念念不忘、需我常常反省的痛苦。为了写就这部回忆录,在这段时间里,我只顾忙自己的事,对家里人很少顾及;可她和他们一直理解我,体谅我,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在此,我要表示深深的谢意。

目 录

加尔布雷思的生平、著作和主要学术观点	1
鸣 谢	4
第 一 章 大湖北边	1
第 二 章 伯克利和美国的高等教育	18
第 三 章 初涉华府	34
第 四 章 民主前的哈佛	45
第 五 章 启 示	60
第 六 章 海外学子	76
第 七 章 插 曲	97
第 八 章 华盛顿,1940 年	114
第 九 章 见习物价权威	133
第 十 章 战争内幕	157
第 十 一 章 错误的作用	177
第 十 二 章 艰难的较量	191
第 十 三 章 德国,1945 年	208
第 十 四 章 阿尔贝特·斯佩尔及以后的岁月	224
第 十 五 章 日本,1945 年	246
第 十 六 章 寒 风	259
第 十 七 章 《时代》—《幸福》—《生活》—卢斯	276
第 十 八 章 重返学术界	292
第 十 九 章 阿德莱·史蒂文森	309

第二十章	经济萧条、股市狂跌、共产主义及加拿大太平洋 铁路.....	330
第二十一章	印度最初印象和《富裕社会》.....	350
第二十二章	阿德莱·史蒂文森再度竞选	371
第二十三章	肯尼迪,民主党和《新工业国》	387
第二十四章	肯尼迪:竞选活动	406
第二十五章	外交;秘密特工	426
第二十六章	国务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印度	437
第二十七章	对一场战争的个人见解	461
第二十八章	林登·约翰逊	486
第二十九章	越南:开始阶段	507
第三十章	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	529
第三十一章	暴力集会	547
第三十二章	《新工业国》及其发表之后	564
第三十三章	尾 声	581
译后记	596

第一章 大湖北边

安大略省南部在地貌上、种族上和历史上都没有特别之处。底特律河和尼亚加拉河之间是大约 200 英里的一马平川。这里土壤肥沃,但间或也有沙土地,灌溉条件差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合耕作的土地。没有值得一书的自然地貌特征。人口方面,在种族上稍有不同,主要是苏格兰人——我们也都这样自称。我们的祖先是在 1780 至 1830 年间从苏格兰高地被赶出来的。当时,他们的地主发现养羊获利可观,加之,他们到山这一边看条件比较合适,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带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过理查德·艾雷上校(其舅父托马斯·塔尔博特上校开发了位于两河间中部的塔尔博特拓居地)奉命回国率领步兵队为女王陛下作战的事。另一件小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群众普遍反对前去杀戮。我的父亲也持反对态度,当时他在现在称作征兵局的地方任职,凡是不愿意去的他都放他们一马。

历史上最后值得书上一笔的是,我的家乡埃尔金县——我父亲可以算是自由党领袖——派出米切尔·弗雷德里克·赫伯恩进入议会,此人后来成了安大略省的总理。他的政府十分无能,致使保守党在没有任何挑战的情况下在该省连续执政达 39 年之久。

苏格兰人是不受重视的,即使是在埃尔金县苏格兰人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没有哪个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讨好他们。总是有人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并不令人信服的努力去争取选民中的爱尔兰人、犹太人、法裔加拿大人、威尔士人、日尔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

乌克兰人、黑人、奇卡诺人的支持。但从来没有一个拉选票者穿过苏格兰褶裥短裙，赞扬过苏格兰风笛，或用苏格兰人使用的盖尔语说过一个词。倒不完全是因为这样做会被视为荒唐可笑或像山野村夫，而是显得我们在政治上缺乏自我识别，做了也吃力不讨好。

安大略省内的农场一般都有一二百英亩大小，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地都耕种得很认真。我们对统称为庭院的房子、果园和草坪并不十分自豪，但这里的牛品种好，有名气，美国的、乃至阿根廷的买主都慕名前来。每到秋天，层林尽染，色彩斑斓；仲冬时节，大雪过后，大地黑白分明，煞是壮观。这里的人民勤劳守法，邻里关系融洽，相互常以彼此的蠢行傻事逗乐。各家的门户都不上锁，也许是因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偷的缘故。在与我们相邻的达顿村，有一个警察，他的工作基本是名义上的，不过，有的乡民酒醉之后动起武来时，他得去“镇压”一下。有关苏格兰人生活的详情，我在其他书中已有描述。^①

我们家族中移居加拿大最早的成员是 1771 年生于苏格兰的阿盖尔郡，于 1874 年故于安大略省。这是取自位于顿威治镇内沃雷斯顿村附近的布莱克墓地他的墓碑上的记载；不过，后来有一位研究家族史的学者指出，如果这两个时间准确无误，那么，他在父母相遇前一两年就出生了。我父亲原是个教师——后来也从未完全弃教——帮着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合作性质的保险公司（此前他还帮着在邻里搞起了第一个电话服务站），而且还是镇、县两级政府里报酬颇丰的官员。我的母亲，美丽慈祥，很有主见，但辞世较早——当时我的哥哥，两个姐妹和我最大的也才 10 多岁。我家有两个农场，共占地 150 英亩，大多是可耕地。后来的年月里，邻居中因年大体弱或暂时无劳力而无人耕种的土地也并了过来。无论

^① 见《苏格兰人》（波士顿：霍顿·米夫林书局，1964 年），该书在英国出版时使用的书名为《天生韧性》和《非饮用苏格兰威士忌》。

从哪方面说,它们都属经营中的农场——只是当时人们不知道这种分类,因为那时并无其他种类。在我们的农业中唱主角的是一群虽不著名但却与众不同的纯种短角牛。农场的经营、短角牛以及我父亲在当地的显赫地位,都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我现在就该作一说明。

* * *

除了极个别例外,农民都有一种严重的自卑感——这一度曾被称为自卑情结。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农民,在美洲如此,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由于大力强调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强调从事耕作所获得的精神上、道德上的品质,这种自卑感多少得到一点补偿。住在城镇里的人自认为生来就比别人高明。而在地里劳作的农民与大土地拥有者截然不同,他们随时随地都觉得自己是乡巴佬。这种态度也进入了与农业有关的学术、专业和政治界。这一点,我会反复提及。

在我们家,特别是对我来说,这种自卑感和相应的补偿趋势由于公认的家族社会地位而变得复杂起来,也许还变得有些得罪人。人家都认为加尔布雷思家的人比别人聪明,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错。我们也比别人富一些。我们家的许多邻居在听了父亲的解释之后才知道他们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该采取什么立场——较低的关税、合伙购买肥料和打包绳、本省公路系统、乃至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会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个家给了我两样东西,一是农家孩子固有的不安全感,二是想把所见所闻告诉大家的强烈愿望。

由于从小就耳闻目睹农业生产劳动,我对体力劳动的艰苦性有实实在在的感受,那种使人不快的情景我永世难忘。整日从早到晚拖着沉重的步子越来越不情愿地跟在犁耙后面,在毫无兴味

的安大略土地上无休无止地来来去去,使人很自然地认为其他所有工作都比这容易得多。早期的这种生活与后来在哈佛的生活简直无法同日而语。在哈佛大学,每周上课6小时以上,就常被视为对学术自由的严重损害。我到大学任教以后,在教工俱乐部,在社交场合,甚至在校园里,经常有同事带着非常不安的神色关切地问我:“肯,你这样干,不是太苦了自己了吗?”上一年我搞了一本书,又有一本即将问世,都是与我教的政治学有关的。他们的话自然是出自对工会规定的关注。我每次都是一忍再忍才没有蹦出这句回答:“朋友,问题在于你从来没有在农场工作过。”

在汽车装配线上工作,干建筑工人,甚至捡垃圾,都会有趣味相投的同伴,而且还有较高的收入。这些都比在农场工作强得多。正由于这样的反差,如今土耳其人才离开安纳托利亚乡村到柏林去,使柏林成了世界上土耳其人非常集中的城市之一;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才到瑞士去出卖苦力;阿尔及利亚人和葡萄牙人才去上法国人的生产线;美国南部农村的人才到底特律去。底特律并非天堂,但在美国南方腹地采取租佃分成制的农夫以及在阿巴拉契亚高原上贫穷农场里收成可怜的农夫眼里,它却是极好的去处。如果工业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国的农民就会到西欧去做那些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已感到太枯燥无味的工作;美国的一些日常的劳务活将会由墨西哥人来干。

* * *

我年轻时,在安大略省农村,声望高些的家族的男孩子先是求学,毕业后往往当中小学老师,当牧师、医生和律师的为数极少。加尔布雷思家族的孩子就是这样。其他人家的男孩早就休了学,因为人们认为读书与干活相悖,这在当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中学教室里呆上几年,男孩子连重一点的农活都干不动了。当地(也许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有句民谣说的就是读书无用:“当个好农民只要身板结实,不怕头脑简单。”

这样准备务农的人常常到底特律去,往往是过了冬天就返回,也有的就一直留在那里。在底特律河上过来过去是常事,大家都知道移民局和海关的官员只从外表上是分不出谁是加拿大人谁是美国人的。在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我们可能要算是最不受民族情绪束缚的了。我们小学课本的封面是英国国旗,课本上对詹姆斯·沃尔夫少将、威廉·莱昂·麦肯齐、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以及英王乔治五世说的都是好话。但是这些都挡不住美国的好日子、惬意的工作和高得多的工资收入的诱惑。

确实,在那些文明的年月里,一些人感到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必须专一地履行加拿大政治生活中的所有义务。加拿大可以比作母亲,但密执安可以是情妇。加拿大的选举没有确定的日程;如果某一届政府被迫下台或感到有机会延长任期,选举就可能在春季、夏季、秋季,甚至像最近这样在加拿大的冬季进行。而美国的选举,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在11月。这时,加拿大的庄稼已经收完,人们开始季节性地转向美国的装配线。这样一来,一个人可能夏天在加拿大投了票,而在秋天又可以经底特律民主组织允许,以(可能是从殡葬主任处拿到的)一个登了记的名字在密执安投票。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腐败之嫌。大家都希望两国最好的人能当权。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能限于爱一个国家,就像以前只能爱一个女人一样!

在其他方面,倒是有优势的。1963年5月,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莱斯特·B·(迈克·)皮尔逊总理在海恩尼斯进行会谈,讨论的问题包括加拿大民航飞机进入美国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十几年来,当加航请求允许飞到迈阿密、洛杉矶或其他商业、文化或

旅游中心时，美方总是问它准备拿什么航线来交换。加拿大的主要城市距离两国边界都只有若干英里；美国在飞到位于詹姆斯湾的穆索尼或再北一些的耶洛奈夫市方面又没有多大的需求。由于加拿大没有什么对等的东西可以交换，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着，而加拿大人只好深入美国到底特律、布法罗甚至纽约去换乘美国飞机。

这两位政府首脑商定指派一个两人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这一来，僵局就可望打破。肯尼迪考虑到我常自称是加拿大人，便指派我为美方代表。皮尔逊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出于同样的考虑，说我是加拿大代表的合适人选。他们二位都认为作出这样高效率的安排双方都需要有一定的节制。我先后在华盛顿和渥太华与主管飞机和规章制度的官员开会讨论。我发现双方对现行的中途换乘安排都不满意；而且，这个问题与大多数国际争端不同，涉及的只是钱，也就是将来的收入问题——这好办，双方平分即可。我仔细考虑了双方的几个主要分歧后，提出了使两国的有关方面都满意的方案。在此过程中，各航空公司都对我殷勤有加。我的方案遂提交两国的代表们。勿庸置言，他们相互讨价还价，用了不少时日。显然，我对双方的忠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 *

1926年初秋，我18岁时，由于农业、尤其是短角牛对我的影响——当时我被认为在这方面很在行——我便考进了安大略农学院。我10岁开始上中学，但因为农事，加上有一段时间家里人认为我身体不好，我的学业经常中断，我的成绩平平——不过它也如实反映出我很早就喜欢博览群书。为了赶上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以及自那以来的许多人，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做学问方面比别人有持久性。但是，在那个年月，有了中学文凭，上大学——无论上

哪个大学,就完全是个钱的问题了。钱,我们家的农场提供了;而且父母在生孩子问题上早有安排,使年长者能为年少者上大学提供资金。

安大略农学院以及与该院学科相关的家政学校、兽医学校,怪得很,还有一所烧烤艺术指导研究院,当时都在(现在仍然在)多伦多以西大约五六十英里的圭尔夫市。农学院的学位由多伦多大学授予。现在,安大略农学院已变成圭尔夫大学。该院升格时,曾请我回去接受第一个名誉学位。嘉奖状把我描绘为“我们最尊贵的毕业生”。前一天晚上,校长向我宣读嘉奖状时,我好像听成了“我们唯一尊贵的毕业生”。这个提法不确切;与我同批毕业的有研究维生素的大师托马斯·H·裘克斯,还有其他一些人。次日上午将举行典礼。一大早我就起了身,在我熟悉的绿荫遮蔽、灌木丛丛、十分美丽的校园内漫步,感到心旷神怡。正走着,遇到一位我上学时的教授——很有生气的农学家。30年过去了,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停下来,和我握了手,说:“我从报纸上得知,加尔布雷思,他们将授予你一个名誉学位。”

我对他鞠了个躬,表示承认。

他威胁性地摇摇拐杖说,“要是按我的意思,他们该收回你已经获得的那个学位。”由此可见,我在大学读书时,反映并不好。

* * *

在我那个时代,安大略农学院的学生可粗略地分为农业经营者和农民两种——不过这两个术语只表示区分而不表示它们当代的用法。农业经营者大多来自安大略的农场,不过也有些来自沿海省份,那里的农业较差,不配有我们这样的学院。农业经营者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为了今后不务农才学农业专业的,他们的最大抱负是在县里谋个被称作农业代表的差事。在安大略省,农业代表